

黄怀信◎著

上海博物馆藏

战国楚竹书《诗论》

解义

54

上海博物馆藏
战国楚竹书《诗论》解义

黄怀信 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序
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册收录的《诗论》，是这批珍奇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2000年8月，“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于北京大学举行，马承源馆长提出论文介绍，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。简的材料公布后，学者更多有论述。有关经过和论点，安徽大学刘信芳教授有《孔子诗论述学》一书，作了详细综括。

我在为刘书所写序言里讲过：“说《诗论》是十分重要的发现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这篇文献记述了孔子对《诗》的系统观点，代表了早期儒家的《诗》学，然而在秦火以后无人传述……如今重新出现，其价值之珍贵，影响之巨大，可谓不言而喻。”这样关系重大的古文字文献，自然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，才可能阐发其中的秘蕴。

曲阜师范大学黄怀信教授在《诗论》发表后，即着手分析探索，对这篇简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，都反复推求斟酌，得出自己的见解。熟悉黄怀信教授作品的读者，都知道他多年从事先秦典籍研究，所著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孔丛子》（特别是《小尔雅》）等方面的注释论作，类皆功力深厚，说理缜密。现在他把对《诗论》的研究，集聚撰著为《诗论解义》一书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行，一定会博得学术界及关心《诗论》的读

者大众的欢迎称许。

《诗论解义》的特点，是推论的谨慎，立说的平允。例如对于《诗论》的作者，学者有孔子、子夏、子羔等说，怀信教授则从篇文所用词语的时代特点入手，认为应成书于战国早中期。又如由《诗论》看当时《诗》的构成与结构顺序，认为皆与今传本同。至于部分《诗》篇名称的差异，他主张有的是字误或脱文所致，有的乃后人改造。这一类论点在书中很多，都属平实可信。2004年6月，怀信教授出席在大连大学召开的“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”，将一些看法压缩为论文《从〈诗论〉看战国时代的〈诗〉》，得到与会同行专家们的肯定。这也说明，《诗论解义》的问世会对这方面研究的进展起明显的推动作用。

怀信教授在这部书里征引了我关于《诗论》简编排考释和理解的一些意见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我的那些想法都是不很成熟的，多有改进的余地，希望大家惠予指正。只有一点，由于我的一篇短文迟迟没有印出，怀信教授未能看到，就是我觉得上博简中的《诗论》、《子羔》、《鲁邦大旱》三篇并非合编一卷。

上述三篇简书，均系儒家著作，同时简的形制、尺寸、字的构形、风格，彼此都是一样，如上博各位先生所指出，应为同时制作，同人书写。不过，出自一手的简，不一定编连为一卷。在帛书中即有这种例子，马王堆帛书的《周易》经传、《老子》乙本、《五星占》等，均由一人抄写，但不是同卷。《诗论》等三篇是不是连为一卷，也有待研究考察。

经过整理排比，容易看出《诗论》大多数简是在简上为编绳刻出的契口处折断的，《子羔》简的折断多在上端契口下面两三字处，《鲁邦大旱》简的折断都在中腰契口之下四字处，这说明它们不曾编连在一起，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一致。

这三篇简，只有《子羔》在其一支简背面写着篇题。这支简于重加排比之后，是该篇倒数第三支，当把简卷起时，正好露

在外面。如果三篇简编成一卷，《诗论》、《鲁邦大旱》在《子羔》后面，这支篇题简就露不出来；如果《诗论》、《鲁邦大旱》在《子羔》前面，又不能以“子羔”作为题目了。《子羔》之所以为题，是由于《子羔》篇首句是“子羔问于孔子”，并非因为子羔是三篇的作者。《诗论》的作者固然待考，《鲁邦大旱》记孔子与子贡问答，显然不会出于子羔之手。不知怀信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。

上博楚简还有许多儒家著作，深望黄怀信教授继续研究，撰成更多论述发表。

李学勤

2004年6月15日

前 言

《诗论》，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的一批战国竹简中的一部分，也是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册里的主要内容。全篇共有完、残简29支（最完整的一支长55.5厘米，简宽在0.6厘米左右，厚度为0.1~0.14厘米），被认为是“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”。共有字约1006个，论诗60多篇，其性质相当于一篇讲《诗》学的讲义或论文。

《诗论》随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册发表以来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目前的研究论文，已数以百计，足见学人对它的重视。那么《诗论》的价值究竟何在呢？

首先从文献学角度说，其作为文献本身的价值，已十分可观，因为它是真正的战国古书；同时，它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、较为系统的孔门《诗》学著作。

从学术角度说，《诗经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典之一，“《诗》学”则是中国经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部分。而《诗论》的发现与研究，将对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。具体地讲，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（大意）：

(1) 通过对《诗论》的研究，使我们可以更加直接了解战国《诗经》的原貌，包括文句、篇名、排序等。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《诗经》即《毛诗》，则是汉代人传下来的。汉代以前或更早的《诗经》是什么样子，谁也不知道。尽管有所谓《三家诗》（齐/鲁/韩），但毕竟留传太少，一般只能做间接的推论。有了《诗论》，我们就可以做比过去更直接的探讨。

(2) 有助于“孔子怎样整理《诗经》”问题的研究。比如孔子是否删定过《诗经》？孔子究竟在整理《诗经》上起了什么作用？以及孔子的《诗》学是什么样子，孔子对传统《诗》学起了什么作用？等等。

(3) 有助于对孔子以后《诗》学传承的了解，这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。关于《诗经》的传承，以前并不很清楚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只说“毛公之学，自谓传自子夏”。对《诗经》传承关系比较系统的记载最早出于三国时人陆玑之口（《尔雅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）：

孔子删《诗》，授卜商（子夏）；商（子夏）为之序，以授鲁人曾申；申授魏人李克；克授鲁人孟仲子；仲子授根牟子；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；荀卿授鲁国毛亨；毛亨作《诂（故）训传》，以授赵国毛萇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、萇为小毛公。

似乎孔子以后《诗》学是一元的。而有了《诗论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以后《诗经》并非只有子夏一门传授，从而可改变传统的说法，并且改写学术史。

(4) 有助于对《毛诗序》的认识。比如说《毛诗序》到底是不是子夏所作？《毛诗序》的学术意义，《大序》与《小序》的关系等问题，通过对《诗论》与《毛诗序》的对比研究，都

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决。

(5) 有助于对《毛诗》及《三家诗》的认识。比如把《诗论》与《毛诗》及《三家诗》进行对比研究，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优劣。

(6) 改变人们对传统《诗》学的认识。传统《诗》学著作“汗牛充栋”，其中哪一家见解更接近先秦《诗学》？或者得失如何？通过《诗论》，就可以得到了解。

(7) 不仅关系到其本身所涉及的对当时《诗》学的认识，而且关系到对整个《诗》学以及与《诗》学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认识。

另外，《诗论》还有助于对《毛诗》本义的理解，彻底纠正汉代以来的传统误说。因为《诗论》基本上全讲的是诗的本义。汉代以来的经解尽管以前人们也部分地认识到其中的错误，但总觉得那是权威之说，不愿轻易放弃。有了《诗论》，人们就不会再那么迷信汉人之说。

《诗论》还可以校正今本《诗经》中的部分误字。比如今本《诗经·小雅》有一篇名《裳裳者华》，诗中多次出现“裳裳者华”，而《诗论》(第五章)则作“《棠棠(堂堂)者芋》”。“裳裳”无义可说，所以《毛传》也云：“‘裳裳’，犹堂堂也。”可见作“堂堂”当是本字。而“华”字，传统也不以为误。然而诗中“裳裳者华”下还有“其叶湑兮”。大家想想，既然是“华”，怎么还会有叶？可见作“华”不如作“芋”。“堂堂者芋，其叶湑兮”，意思是“堂堂大芋头，叶子真繁盛”。芋头才有叶子，而华没有叶子。不过也有人认为《诗论》误而今本不误，无疑是没有读懂原诗。

总之，诚如李先生所说，《诗论》的发现，将极大地促进《诗经》学、经学史、学术史，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。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：在中国历史上，新学问的产生，皆由于有

新的发现。所以，就像汉代因鲁壁中经发现而产生古文经学、19世纪末因殷墟甲骨文发现而产生甲骨学、敦煌文书发现而产生敦煌学一样，“上博简”及《诗论》的发现，也将随之产生新的学问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可以想像，《诗论》研究也不会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。

《诗论》研究包括哪些问题呢？就目前看，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上。

（一）篇名问题

《诗论》发表之时，整理者命名为《孔子诗论》。后来学者们发现，其内容并非全为孔子语，而是还有非孔子语者，从而断定其作者不是孔子。于是很多学者便省去“孔子”二字，而直称之为《诗论》。所以现在一般都称《诗论》。

后来，又有学者提出，应该定名为《诗说》，原因是名《诗论》与其文章体制不合；还有学者提出，应该更名为《古诗序》，理由是汉代四家诗（齐、鲁、韩、毛）都有“诗序”，所以应仿照“齐《论语》”、“鲁《论语》”、“古《论语》”的说法，称此为“古《诗序》”，等等。那么，这些说法有无道理呢？首先我们看所谓“《诗说》”：什么是“说”呢？作为书篇名，“说”一般是指对原“经”进行说解、叙说或阐发。而我们看到的《诗论》，则并不是对原诗进行说解和阐发，而是归纳或概括诗篇的特点与大意，完全类似于现今的论文。所以，以我个人看来，与其名《诗说》，还不如就叫《诗论》更合理。

再看所谓“古《诗序》”。什么是“序”呢？序者，次也。就是次序。古书之有《序》，始于《尚书》。《尚书序》，相传是孔子所作。《尚书序》讲什么呢？《尚书序》是以次（按次序、年代次序）讲《尚书》各篇之所由作。就是讲各篇是怎么作出

来的，为什么作，主要讲什么。其“序”有次序的意思。后来有《诗序》，无疑是受《尚书序》的影响而作。而这个“序”，已没有次序的意思，因为《诗经》本来就不是按时代编排的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尚书序》完全是根据每篇的实际内容而写的，是就书论书。而《诗序》，则完全是不顾诗本义，而是将诗政治化，是寓政于诗，是借诗以言政教，即所谓“诗教”。如什么“后妃之德也”、“美君子也”、“刺不壹也”等等。可见它是把《诗》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来用，与《尚书序》的提要性质根本不同。而《诗论》，与这两种《序》的性质又皆不同，所以根本不能叫做“古《诗序》”。

（二）作者及成书时代问题

文献的作者及成书时代，直接关系文献的价值及意义，《诗论》也不例外。前面说过，《诗论》发表之时整理者命名为《孔子诗论》，说明他们认为作者就是孔子。后来发现不对，于是就有新的讨论。目前，主要有“子夏”说、“子羔”说和“孔子再传弟子”说三种。以我个人之见，子夏（卜商）、子羔（高柴），都不可能是《诗论》的作者。一个明显的证据，就是《诗论》里面六称“孔子曰”，而不称“子曰”。“孔子曰”和“子曰”有什么不同吗？有！根本不同。“子”，是对人的尊称。学生称老师为“子”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称“先生”。所以“子曰”，就是“先生说”；而“孔子曰”，就是“孔先生说”。还有“夫子曰”，就是“老先生说”的意思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如果是孔子的学生，他应该称什么呢？他们只有一个老师，难道还用得着称“孔老师”吗？显然是不会的。另外，《诗论》的思想，与子夏也不相同，比如第一章论《关雎》，与《诗大序》存在很大距离。当然，与子羔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。所以，其作者不应当是子夏或子羔。而应当是孔子再传弟子。至于具体是哪位再传弟

子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
关于其成书时代，我认为应当是在战国初期，孟子之前。因为《诗论》提到“王”（就是以“王”做动词）。如第十二等章曰：

《清庙》，王德也。……行此者其有不王乎？

王，指王天下，即统一天下。这是战国特有的一个带有时代特色的词汇。如《孟子》中说“以齐王，犹反手也”，“王之不王，非不能也，不为也”等。所以时代应该比较接近。

（三）“孔子”还是“卜子”或“子上”的问题

《诗论》中六次出现“孔子曰”，其“孔子”二字，本作合文“𠂔”带重文符。有学者提出，“𠂔”应释为“卜子”，也有人认为应释为“子上”。如果那样，整个《诗论》就与孔子没有关系了。究竟应是什么字？审视照片，“子”右上角确实像个“卜”字。但是，即使是“卜”字，也不能释为“卜子”。因为“子”下有重文符。重文符的意思，是表示该字重复用（一兼二用），要读两次。那么“子”既然要一兼二用，怎么能释为“卜子”或“子上”呢？因为“卜”中无“子”，“上”中也无“子”。所以，这个字必须释为“孔子”。至于它的字形不太像“孔”，也无关紧要。因为我们今天写字有时候也写不像，竹简上面的字有一点错又算什么呢？重要的是，其“孔子曰”有与传世文献中孔子之言十分相似或一致者。如第二章引孔子曰：

吾以（於）《葛藟》，得氏（祗）初之诗（志）……吾以（於）《甘棠》，得宗庙之敬……[吾以（於）《木瓜》，

得] 币帛之不可去也。

《说苑·贵德》引孔子曰：

吾於《甘棠》，见宗庙之敬也。甚贵其人，必敬其位。

无疑出于同源。又《孔丛子·记义》载：孔子读《诗》，及《小雅》，喟然而叹曰：

吾於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见周道之所以盛也；於《柏舟》，见匹妇执志之不可易也；於《淇澳》，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；於《考槃》，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；於《木瓜》，见苞苴之礼行也……

可见句式完全相同。而“於《木瓜》，得币帛之不可去也”与“於《木瓜》，见苞苴之礼行也”，意思也完全一样（其文字可能是记录者各取其意而致异）。所以，其人必是孔子。

（四）与《诗序》的关系问题

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关系，也是目前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。李学勤先生说：“现在看，《诗论》、《诗序》、《毛传》，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，实际距离是相当大的。”诚哉斯言！而有学者则认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，并且推论竹简《诗论》，可能就是《毛诗序》的最早祖本。

究竟怎么样呢？据我个人观察，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，几乎没有关系。当然，在思想观点上，确实也可以看到一点联系。如第一章论《关雎》等篇，可以看出其与孔子学说有关。而《诗序》也与孔子学说有关。但不能说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二者之

间有直接关系。另外，我们已经知道，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性质完全不同。《诗论》基本上是就诗论诗，说明诗本义；而《诗序》则完全是讲义理，言政治。所以，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关系。就是说，它们是二元的东西，属两种体系。但它们又都是《诗学》系统的产物，因为都讲《诗经》，而且同属儒家。

（五）“留白”问题

《诗论》简中有六七支简的上下端分别留有8公分左右的空白，学者称为“留白”。“留白”上下的文字无头无尾，而且彼此不相直接衔接，所以可以肯定“留白”部分本来有字。那为什么要“留”呢？一种意见认为，是当时抄写的时候由于底本有残缺，所以抄手就把所缺的地方留下，以备将来补全，就是说“留白”属于预留；还有一种意见认为，“留白”部分本来也有字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脱掉或被人故意削掉了。我认为“预留”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如果说是底本残缺的话，为什么几个地方缺的都一样呢？所以我倾向于后人因故有意削去一说。最大的可能，是宗教方面的原因，或许与当地的葬俗有关也未可知。因为“留白”诸简恰好在篇末部分。

（六）文字考释

文字考释，就是把简上的战国文字用现代汉字改写出来。尽管《诗论》出版之时整理者已对《诗论》文字进行了基本的考释，但文字考释依然是迄今研究工作着力最多的一项内容。因为一则出版之时部分文字包括篇名未能释出，二则是个别怪字争议较大。因为有的字写得比较怪，以前没有见过，于是就免不了要去猜，就像猜谜一样。比如第一章第一句“《关雎》之改”的“改”，由于“改”字原简左边从“巳”，与现在的“改”字不一样，所以迄今至少已有近十种说法，如有释“怡”、“妃”、

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哀”、“已”、“改”等。而实际上，它就是个“改”字，释为别的字于文于诗皆讲不通。

为什么会释错呢？原因有三：①就字论字，没有结合文义。比如原文本身已讲得很明白：“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，以钟鼓之乐……好，反入于礼，不亦能改乎？”明言“反”，这不就是“改”吗？②误解了诗义。比如为什么会释为“怡”或“𠂔”呢？因为他们误解诗义，以为《关雎》是“贺新婚之诗”。而事实上，诗本义并未成婚。③受《诗序》影响。比如为什么会释为“妃”呢？可能是因为《诗序》云：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”而事实上，《诗序》之言根本不可信。

再比如第十三章“诗亡（无）隐志，乐亡（无）隐情，文亡（无）隐意”的“隐”，有的释“离”，有的释“吝”，有的释“远”，有的释“御”，有的释“泯”，等等。事实上，只要仔细想想，就能发现释“离”释“吝”等都讲不通：“诗无离志”，什么叫离志？“诗无吝志”，志怎么吝法？显然没法讲。而“诗无隐志”，则明白得多。《尚书·舜典》里说“诗言志”。志，就是思想。意思是：诗是表达思想的。诗既然是表达思想的，怎么会隐志呢？“诗无隐志”，意思是诗没有隐藏思想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诗总能表达作者的思想。可见关键还是没有读懂原文，实际上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。

（七）简支的编联与复原

简支编联，是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。因为原简不仅散乱，而且残损严重，29支简中，完整的只有一支。就好像一本没有标明页码的书散乱开来而且大部分已经残损，你怎样才能把它按原顺序复原呢？显然不很容易。好在《诗经》是人们熟悉的文献，而且竹简本身又不多，所以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大有成效。进行这一工作的有好几家，而最可信、最合理者，我认为莫过于李学勤

先生所编联的。通过对原诗诗义的分析，我觉得其中有两三支简的编联还可以调整，所以又重新做了编联。结果，将李先生所归第二组：八、九、十七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三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六的简序调整成为：十七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二十三；八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六。

分章，就是分段。对《诗论》进行分章的目前也有好几家。李先生在原整理者所分四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，把 29 支简归为四组，复原为十二章。我个人认为基本上也是可采信的。只是第三章，我认为可以再分开，因为后面一部分不像是孔子语。这样一来，就成了十三章。

另外，要复原就得补字，而一处地方到底该补什么字，首先得确定它到底缺了几个字。不然只凭文义，不是补多就是补少。所以我在各家的基础上，重新计算了各简所残长度及应缺字数，以此为前提补出了一些能补的字，删除了一些各家多补的字。如第二十五简和第二十六简，此二简字体密度相当，以长度（合 40.4 厘米）算，有可能本属同简。简二十五下端文字为“《小明》不”，据文例所残当不超过 2 字；简二十六上端为一“忠”字，依例上当为一篇名。加起来二简之间当缺 5 字左右。如此，则上下端分别当缺 2~3 字，满简当为 54 字，所以我将此简复原为：

《[君子] 阳阳》小人。《有兔》不逢时。《大田》之卒章，知言而有礼。《小明》不[得归]。25 [《节南山》] 忠。《邶·柏舟》闷。《谷风》悲。《蓼莪》有孝志。《隰有苕楚》得而悔之也。□□□

又如第六简：整理者曰：“本简残为两段，已缀合，总长 49.5

厘米。上端残，下端弧形完整。上段留白残缺，下端留白8厘米。现存48字，其中合文一。”所以一般于上端补“《清庙》曰：肃雍显相，济济”9字。视照片，简端“多”上似有一残字，若再加留白8.5厘米，则本简似嫌过长，故我认为此简上端当无留白。以较完整而又与之相近的第九简（长53.8厘米）例，此简上端当残5厘米左右，依例当缺5字左右，所以我将此简补为：

〔《清庙》曰：“济济”多士，秉文之德。”吾敬之……

删掉了“肃雍显相”四字，等等。

（八）孔子语与非孔子语的区分问题

全部《诗论》中六引“孔子曰”。毫无疑问，“孔子曰”以下就是孔子的话。但孔子的话到什么地方为止，从什么地方又是作者的话，就不好区分。比如以“孔子曰”开头的几章，是否整章都是孔子语，就是问题。还有以非“孔子曰”开头的几章，因为有的前面有残缺，那么你能否肯定它就不是孔子语？也是问题。所以，这一方面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。现在大家将看到的，凡我认为是孔子语者，我都加了引号。

（九）断句问题

断句方面基本上问题不多，但目前至少还有三四个地方分歧较大。如第一章：

《关雎》之改……《燕燕》之情，害（曷）？曰：童（终）而皆贤于其初者也。

有学者读“害”为“盖”，断为“害（盖）曰童（动）而皆贤于其初者也”。第二章：

其言有所载而后内，或前之而后交，人不可干也。

有学者读后句为“交（佼）人不可干（盱）也”。第五章：

《青蝇》知[谗]，《卷而（耳）》不知人，《涉溱》其绝，《著而》士，《角枕》妇，《河水》知。

以前有学者读“《青蝇》智，《卷而（耳）》不知人……”有学者读“《墙有茨》慎密而不知言。《青蝇》知卷（患）而不知人。《涉溱》其绝律而士；角枕妇。《河水》知”。第十一章：

[孔子]曰：诗其犹平门。与戈（贱）民而豫之，其用心也将何如？

一般读“孔子曰：诗其犹平门与（欤）”为句，“与”字属上。如此之类，本解义也都一一做了辨析与交代。

（十）第一章“《关雎》之改”等七句是引文还是作者语

《诗论》第一章前七句话，学术界对它的语主认识不一。原文作：

《关雎》之改、《樛木》之时、《汉广》之智、《鹊巢》之归、《甘棠》之保、《绿衣》之思、《燕燕》之情，曷？曰：童（终）而皆贤于其初者也……